



慧遠對佛教禪林建制濫觴的貢獻

歐陽鎮

自東漢佛教開始傳入中國，隨着漢譯佛經和佛教寺塔的不斷湧現，漢地已有信徒出家受戒成爲最初的僧人。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僧團的擴大，僧團內部就必需一定的規章制度和戒律來規範僧人的行動，保護僧團的利益，諸如中國佛教史上著名高僧釋道安、慧遠等都會制定過一定的僧尼規範。這些規範，在當時不僅保證僧尼在禪林中過正常的宗教生活和維持禪林的穩定，而且協調僧尼與禪林、禪林與社會的關係。直到現在，它在佛教禪林中仍具有重大的影響。關於釋道安的事跡，本人已有專文撰述，在此僅就慧遠對禪林的建樹作一論述。

慧遠（公元三三四——四一六年），本姓賈，雁門樓煩（今山西寧武縣）人。他「世爲冠族」，（張野：『遠法師銘』）「少爲諸生，博綜六經，尤善老莊」，（『高僧傳，慧遠傳』），年二十一，與弟慧持一同從道安出家爲僧，很快成爲道安的首弟子。東晉太元三年（三七八），前秦將攻襄陽，道安分張徒衆，慧遠東下，先至荊州，三年後到潯陽（今江西九江），

因見廬山清靜，便停留此地，江州刺史桓伊特爲其建東林寺，慧遠從此便在東林寺傳教、修道和從事著作，影不出山三十餘年。

慧遠初事道安，「常欲總攝綱維，以大法爲己任，精思諷持，以夜繼晝」（『高僧傳，慧遠傳』）。他接受的佛教思想是多方面的，早期追隨道安的般若學；定居廬山以後，先是鑽研毗曇學，曾將前秦時參加道安譯場的僧伽提婆請到廬山，譯出『阿毗曇心論』四卷和『三法度論』二卷（此即前秦鳩摩羅佛提所譯『四阿含暮抄』的異譯本），後受鳩摩羅什爲首的關河地區中觀派的影响，不僅派遣弟子到鳩摩羅什門下受學，而且頻頻致書答問，討論佛學問題；同時他還迎接被鳩摩羅什僧團排擠的佛陀跋陀羅僧團，接受其禪法，教誨弟子以戒學，其所涉及的範圍，比其師道安還要廣泛。慧遠的杰出貢獻，就在於他把佛教的義理同維護名教的儒家傳統理論有機地協調起來，調合在一起，把佛教的適應世俗要求同對出世間的追求分別開來。（『弘明集』卷五

「答桓太尉書」），這樣，佛教就不再簡單地被當成統治階級某種文化政策的點綴品，它已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。

慧遠繼承其師遺志，熱情弘法。在安居廬山東林寺後，常慨南地經、律未備，特遣弟子法領、法淨等西逾流沙，遍尋經律。每逢西域來到江南的高僧，輒懇惻咨訪。（『高僧傳』，慧遠傳）如對罽賓高僧僧伽提婆和佛化跋陀羅等就是如此。其他如從龜茲鳩摩羅什的阿含學老師佛圖舌彌處得到「比丘尼戒本」的僧律，後來亦從長安到廬山，就受到了慧遠的熱情接待，尋問「比丘尼戒本」的內容和翻譯情況。慧遠在廬山，還非常關心鳩摩羅什與弗若多羅對「十誦律」的翻譯，後秦姚興弘始六年（四〇四年），弗若多羅不幸去世，「十誦律」的翻譯不得不暫時停下來，適時精於律藏的曇摩流支來華，慧遠便致書於他，勸請他幫助鳩摩羅什將此律補譯完成，由是「十誦律」才得有完備的譯本。

慧遠如此重視戒律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。佛教在中國發展到東晉末年，已普及江南各地，帝王公卿、文人學士奉佛者日多，僅建業一地，寺院就有數十所。特別是在孝武帝時（三七三—三九六年在位），琅琊王司馬道子竊弄權柄，「妯娌尼僧，發為親近」，「僧尼乳母，竟進親黨」；（『晉書·簡文之子傳』）又受賄賂，輒臨官領象言：「晉祚自此傾矣」。（『晉書·孝武帝本記』）安帝時（三九七—四一八），佛教徒穢染的情況更為嚴重，他們「或墾殖田圃，與農夫齊流，或商旅博易，與家人竟利；或持醫道，輕作寒暑；或機巧異端，以濟生業，或占相孤虛，妄論吉凶；或詭道假權，要射時意；或聚畜委積，頤養有餘；或指掌空談，坐食百姓。斯皆德不稱服，行多違法，雖暫有一善，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，是執法者之所深疾，有國者

之所大患。」（『弘明集』載道恒「釋駁論」）針對這種情況，慧遠一方面大聲疾呼「沙門不敬王者」，號召佛教徒脫離政治，從干預政治和政治鬥爭中解脫出來，保證佛教的獨立弘法，要求僧徒依法尋道；另一方面，他廣泛地搜求戒律，為自己的僧團建立「社寺節度」、「外寺僧節度」和「比丘尼節度」。（『出三藏記集』卷十二）在這些節度中，盡量調和佛教與各教的關係，將儒家的禮運用到佛教和僧侶的行為准則之中，從而使佛教逐步走向中國化的道路。

慧遠不愧是道安之後最著名的佛教領袖之一。他所組織的一百多人的僧團，都能按照他所建立的清規節度，「洗心法堂，整襟清向，夜兮忘寢，夙宵惟勤」（慧遠·『念佛三昧詩集序』）。致使一些王公貴族如王凝之（王羲之之子）、桓玄、何無忌、殷仲堪、王謐、謝靈運、劉裕（即南朝劉宋的開國者）等都願和他交往，關係密切，此外，還使一些名士，「並不期而至，望風遙集，彭城劉遺民、豫章雷次宗、雁門周續之、新蔡畢穎之、南陽宗炳、張萊民、張季碩等，並棄世遺榮，依（慧）遠游止。」（『高僧傳』，慧遠傳）元興元年（四〇二年），桓玄攻入建康，殺掉專擅朝政的司馬元顯，自己專擅朝政，下令沙汰僧尼，又令各地官府搜簡僧尼，登籍造冊，但特別關照：「唯廬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簡之列。」（『弘明集』卷十二，「與僚屬沙汰僧象教」）這並非因為桓玄與慧遠有很深的情誼，最主要的恐怕還是以慧遠為首的廬山僧團戒行修整，不營流俗的緣故。

總的說來，慧遠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，改造佛教傳入中國後產生的諸多學派的學說，以及他建立的廬山僧團及其儀規節度，為在中國發展獨立的佛教學說，和中國佛教禪林制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